

近代東亞「新佛教」視野下的臺灣 佛教改革運動：以《南瀛佛教》佛 教振興與改革徵文為中心

林韻柔

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法鼓佛學學報第 37 期 頁 165-219 (民國 114 年) · 新北市：法鼓文理學院

Dharma Drum Journal of Buddhist Studies, no. 37, pp. 165-219 (2025)

New Taipei City: Dharma Drum Institute of Liberal Arts

DOI: 10.53106/199680002025120037006

ISSN: 1996-8000

摘要

近代東亞各國，包含日本、韓國、中國與臺灣，均出現「新佛教運動」，主張消弭從舊佛教而來的迷信、俗信，從而建立基於理性理解佛教義理與歷史事實而來的「新信仰」，並基於此一目標推動一系列「復興／振興」佛教的舉措。日治時期的臺灣佛教界也出現一批大聲疾呼、力圖改革的佛教青年，他們接受新式佛教僧伽的培育，對於佛教的教義、活動，以及面對時代、社會應該扮演的角色，均與過往有所不同。本文將以日治時期佛教界發聲的代表刊物《南瀛佛教》中出現的佛教振興與改革徵文為核心，考察相關倡議者、佛教改革議題的變遷，並探究其間所涉及的日臺佛教網絡與時代思潮。

目次

- 一、前言
 - 二、南瀛佛教會與臺灣佛教改革
 - (一) 南瀛佛教會的成立與發展
 - (二) 《南瀛佛教》與佛教改革的推動
 - 三、《南瀛佛教》所見佛教改革倡議者
 - (一) 立基於「儒釋同源」的佛教振興倡議
 - (二) 延續日本新佛教運動的改革倡議
 - 四、結語
-

關鍵詞

南瀛佛教、新佛教運動、林述三、林德林、佛教改革

一、前言

近代東亞諸國共同面對的時代變局，在於來自西方世界政治、軍事、經濟、宗教、學術、思想、文化等層面上的挑戰，無論是國家政體、社會型態、宗教形式、文化內涵，均不得不對於千年未有之變局做出因應。東亞各國的因應之道，雖然有所不同，但卻是彼此相繫連動，相互影響。1895年之後的臺灣，成為日本西化改革體制下的殖民地，隨著日本統治的推展，臺灣的政治體制、行政制度、教育文化、學術思想、社會結構，乃至於宗教信仰等各層面，無不受到近現代化後的日本之影響。

近代東亞各國，包含日本、韓國、中國與臺灣，均出現「新佛教運動」。日本的新佛教運動，是指出現一批自稱／自認有別於舊佛教的「新佛教徒」，基於批判「具有朽腐

* 收稿日期：2024.5.1；通過審核日期：2025.6.16。

感謝二位審查人提供寶貴修訂意見，使本文論述得以更臻完備。本文為執行財團法人聖嚴教育基金會「漢傳佛教四百年：文獻、歷史與文化」整合型研究計畫之子計畫「日治時期臺灣的新佛教運動」、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近代東亞新佛教運動的交涉與傳播——以日本《新佛教》雜誌相涉人物為中心」（MOST 110-2410-H-194-107-MY2）、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近代東亞新佛教運動與臺灣佛教改革——以臺籍留日學生為探討中心」（NSTC 112-2410-H-194-075、NSTC 113-2410-194-064）成果之一。

本文部分曾分別發表於財團法人聖嚴教育基金會主辦之「第九屆漢傳佛教與聖嚴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2023年6月29日至7月1日）、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主辦之「法界安立：東亞文化交流視域下的佛教文化與政教關係」學術研討會（2023年11月24-25日）。承蒙闕正宗、侯坤宏、廖肇亨、陳威璿、嚴璋泓、林佩瑩、劉家幸、徐維里、黃庭碩等先生提供寶貴意見，助成本文之撰成與發表。謹向諸位先生致上由衷感謝。

習慣的舊佛教」，務求革新只在意面對木像佛畫唱名念佛「圖具瀕死形式的舊佛教」、只期待現世利益的「迷信舊佛教」、只強調來世卻絲毫不管現實世界義務與正義的「厭世的舊佛教」，以及實際上並未實踐佛教教義的「空想的舊佛教」（菅沼晃 6）。「新佛教」的目標是消弭從舊佛教而來的迷信、俗信，從而建立基於理性理解佛教義理與歷史事實而來的「新信仰」（江島尚俊 439），並基於此一目目標推動一系列「復興／振興」佛教的舉措。日本佛教的改革，對於中國、朝鮮半島與臺灣等地造成深刻的影響。例如積極推動中國佛教改革的太虛法師，正是接觸赴中傳教的日本佛教後，認識了日本佛教的興盛與發達，進而影響其佛教革新運動的推動。

關於日治時期臺灣的佛教發展，過往在釋慧嚴、江燦騰、胎中千鶴、柴田幹夫、王見川、李世偉、闕正宗、松金公正等諸位先生的討論下，對於日本佛教進入臺灣後教勢的推動開展、相關僧人、宗派、道場，乃至於與臺灣社會相關的教育、文化、政治、社會福利等事業，均有不少深入的討論¹。特別是關於日本曹洞宗、臨濟宗妙心寺派、淨土真宗、真言宗等宗派在臺開教與傳教的相關議題，已累積許多

¹ 胎中千鶴 1998a, 23-45; 1998b, 3-17; 2000, 50-72; 柴田幹夫 2014, 259-260; 2017a, 45-56; 2017b; 2018; 江燦騰 1993; 1997; 2001; 2003; 2005, 287-326; 2006; 2008; 2009; 2019; 2021a; 2021b; 2021c; 釋慧嚴 1997, 279-310; 1998, 119-153; 1999, 249-274; 2003; 2004, 215-242; 2005, 35-63; 2006, 125-148; 王見川、李世偉、闕正宗 1999; 2004; 2008; 2011; 2014b; 2018; 2020, 105-142; 2021; 松金公正 1998, 18-32; 1999a, 383-422; 1999b, 191-221; 1999c, 21-36; 2000, 45-68; 2001, 137-162; 2002a, 213-232; 2002b, 87-109; 2003, 259-290。

重要成果。

然而，日治時期的臺灣佛教發展，不僅是被動的接受日本來臺僧人的教化與影響，此時期臺灣佛教最重要的特色，在於有一批大聲疾呼、力圖改革的佛教青年出現，他們接受「新式」佛教僧伽的培育，對於佛教的教義、活動，以及面對時代、社會應該扮演的角色，均與過往有所不同。他們的出現，與日本佛教宗派隨著政治統治的需求進入臺灣有密切關係。

這些新佛教青年，有其師承系譜，他們在臺灣就讀佛教中學林，更有赴日求學的佛教知識菁英。這些佛教留日學生返臺後，帶著在日本求學習法的經驗，積極推動與參與臺灣佛教界的改革與運作。無論是來臺的日籍僧人，或是臺籍「新佛教徒」，彼此之間存在長久且密切錯綜的關係。他們所經歷與接受的影響，是明治以來佛教在面對政治變動、西方宗教與思想挑戰下，所做出的回應。因此，欲深入理解近代臺灣佛教的發展，勢必得將之置於近代日本佛教變革的影響中來做討論。

基於上述思考，本文將以在《南瀛佛教》抒文呼籲佛教振興與改革者及其文章為中心，² 考察在近代東亞新佛教運動的脈絡下，日治臺灣佛教改革運動的推動者，如何在接受日本佛教的培養與教育下，建構關於「新佛教」的觀念、論述與思想，效法日本推動新佛教運動的作為，後續將再以此為基礎，探討相關人士如何基於相近與承續的培育經驗、認知與理念，凝聚構成推動臺灣佛教改革的群體，結合出版、

² 本文所依據的《南瀛佛教》版本，出於臺灣大學圖書館「佛教數位圖書館暨博物館」網站附屬之「佛學博物館 / 臺灣佛教史料庫 / 日據時期 / 南瀛佛教會報」。

教育與社會活動，連結當時政治、社會與宗教界的力量，推動臺灣佛教改革。

二、南瀛佛教會與臺灣佛教改革

（一）南瀛佛教會的成立與發展

關於南瀛佛教會的成立與相關活動，包含釋慧嚴、江燦騰、闕正宗、姚麗香等學者已多有梳理，本文無意重複論述。但因述及臺灣佛教改革運動，難以脫離南瀛佛教會的成立與發展，此節將以前人研究成果為基礎，鋪陳南瀛佛教會的建立與臺灣佛教改革運動發展的背景。

日治時期臺灣的佛教在隨著殖民統治的日本佛教進入後，產生與清領時期佛教不同的變化。江燦騰即指出，隨著日本佛教各宗派來臺的拓展與影響，臺灣本土佛教道場出現明顯的宗派隸屬，也建立所謂的四大法派（江燦騰 1996，47）。根據江木生於昭和 12 年（1937）的考察，日治時期進入臺灣拓展教勢的日本佛教宗派，包含天台宗、真言宗高野派、真言宗醍醐派、淨土宗、曹洞宗、臨濟宗妙心寺派、真宗西本願寺派、真宗大谷派等七宗十二派，在全島擁有信徒約十七萬人（江木生 1937，15-20）。其中最早來臺傳教的是曹洞宗，其教勢也最為興盛。

據闕正宗研究，日治時期臺灣佛教之發展，可依大正 4 年（1915）發生的西來庵事件，以及皇民化運動為斷限，分為三期。前二期主要是日本佛教至臺布教；及其於西來庵事變後在平行結合的模式下，對臺灣佛教進行同化，並激發臺灣佛教之轉型與新佛教運動之開展。然皇民化運動之後，佛教亦轉為國家教化工具，使其轉型與改造性格頓失（闕正宗 2022a，502-506；2022b，17-86）。

明治 29 年（1896）5 月，日本佛教在臺布教之各團體成立臺灣佛教史上第一個正式的佛教組織：「大日本臺灣佛教會」，成員幾乎均是來臺日僧與日人官民信徒，主要是站在殖民者的統治需要，與灌輸臺人做大和民族「順民」的佛教立場。然而日本官方於此時期對於佛教來臺開教之態度相當冷淡，甚至採壓制手段。江燦騰認為，日本官方對於日本佛教開發新勢力與其優勢的壓制，造成臺灣佛教界的轉機，因此使得日臺佛教發展模式，轉為並存雙軌制；臺灣佛教界得以與日本在臺佛教平行發展，臺灣佛教逐漸轉向大法派形式發展（江燦騰 2001，155-176）。

臺灣的新佛教運動，主要發生在西來庵事件之後，而日本佛教在臺灣的傳布與發展則使臺灣佛教形成四大法派，出現日本化的臺灣佛教；其對僧伽教育的重視，也使得佛教徒信仰水準提高，進而促進新佛教運動的進行。日本來臺佛教各宗相當重視佛教教育，曾在臺灣設立曹洞宗臺灣中學林（即今之泰北中學）、臨濟宗鎮南學林、淨土宗臺南商業學院等校，以及附屬於寺院中的教育機構（江木生 1937，16-17；藍吉富 237-248；闕正宗 2022b，197-261），培育出一批臺灣本土的佛學菁英。

大正 10 年（1921）4 月 4 日，總督府內務局社寺課長丸井圭治郎召集臺灣佛教領袖，成立全臺性佛教組織——南瀛佛教會（〈南瀛佛教會之沿革〉 19-33）³。1922 年，由江善慧（基隆月眉山靈泉寺住持）、沈本圓（臺北觀音山凌

³ 本文所引用無明確作者之資料，一律以文章題目標注，文末引用文獻會詳細標注文章標題、報紙 / 期刊、日期和版面 / 頁面資訊，俾於讀者查索。例如此處資料來源：《南瀛佛教》，第 1 卷，第 1 號，1923 年，頁 19-33。

雲禪寺住持）、陳火（臺北大稻埕龍雲寺住持）、黃監（臺北大稻埕齋教至善堂堂主）等臺灣佛教界和齋教界的領導者，以及臺灣總督府內務局社寺課丸井圭治郎課長等人，會同臺北地區僧侶和齋友，創立南瀛佛教會。「南瀛佛教會」屬半官半民性質的全島性宗教組織，「會長」由文教局長擔任，「副會長」由社會課長擔任，「理事」、「幹事」等職位，則由臺灣本島佛教人士擔任。

南瀛佛教會成立時，會長丸井圭治郎指出：「藉由本島人大宗教團體的設立，能夠一新錯誤迷信，當多少可見對本島的精神界的貢獻。」（〈本島人の宗教を統一近く團體設立〉7）其成立目的在於：「涵養會員德智，與內地佛教聯絡，以圖佛教振興，開發島民之心地，時時開講習會、研究會及講演會，又調查宗教所關重要事項，及發刊機關雜誌。」（〈南瀛佛教講習〉4）闕正宗指出，此一總督府因應西來庵事件主導成立的「南瀛佛教會」，自始即為了提昇僧侶、齋友之素質，舉辦講習會培養人才，「以備將來臺灣佛教傳道布教之基礎」。（〈南佛幹部講習會〉6；闕正宗2020，120）

南瀛佛教會成立後，除刊行《南瀛佛教》雜誌以外，另曾舉辦過十六回佛教講習會，二次特別講習會，三回婦人講習會；地方佛教會支會也曾舉辦講習會與巡迴講演。講習會初期的講師除日籍布教師外，主要為江善慧、沈本圓、林覺力、許林四位，前三位是日治時代臺灣的三大道場領導僧侶，而許林則是知名的齋教人士（姚麗香78）。

昭和5年（1930）起，南瀛佛教會講習會的本島人講師，逐漸轉由赴日留學返臺的青年僧侶等人接替，爾後在「南瀛佛教會」中，這批赴日本駒澤大學接受近代日本佛教教育的臺灣佛教界新菁英，包括林秋梧、李添春（1899-

1988)、高執德、曾景來(1902-1977)、沈德融等人，以及與之多有交往的林德林(1890-1951)，開始著手宣揚佛教改革；並在《南瀛佛教》與其他宣傳場域，針對臺灣佛教與齋教界存在的諸多現象與問題，展開激烈的論辯(闕正宗 2011, 196-209)。

(二) 《南瀛佛教》與佛教改革的推動

自大正 14 年(1925)起，《南瀛佛教》中陸續發表有關「完備僧侶教育機構」(張金出、曾景來)、「建設寺院(管理)制」(曾景來、李添春、林秋梧)、「臺灣佛教界的統一」(林秋梧)、「反對「死守戒律」、「拘泥形式」」(張金出、高執德、曾景來、李添春、林秋梧、林德林)、「反對迷信拜佛」(張金出、林秋梧)、「反對中元普渡運動」(林秋梧)、「民間信仰研究」(曾景來)、「寺廟整理運動」(王進瑞)等，涉及佛教改革等問題的探討與研究文章。這些改革的呼聲，主要是受過日本佛教薰陶的知識分子所提出。闕正宗指出，昭和 4 年至 7 年(1929-1932)期間，《南瀛佛教》刊出一系列涉及改革臺灣佛教、僧尼教育、結婚論的文章，將臺灣佛教改革的論戰帶到最高潮(闕正宗 2011, 220-240)。

根據姚麗香之觀察，南瀛佛教會初期的改革呼聲，是由「統治機關有意引導帶動，希望能藉由『臺灣佛教振興策』的徵文比賽，引發佛教界反省與思考改革問題。」(〈懸賞論文發表〉 40-41；覺空子 11-13；蔡南樵 13-15) 昭和 3 年(1928)起，改革推動者轉移至受過日本佛教教育的佛教菁英。這些推動改革的佛教菁英，對於臺灣傳統佛教的保守與衍生的弊端多有不滿，因此在殖民政府支持其改革的行動下，成為主流的勢力(姚麗香 76-78)。

釋慧嚴指出，當時日本人認為臺灣佛教界欠缺宗教的人格教育，「雖透過功過格談個人、家族道德，但缺乏國家、社會道德」（佐佐木芳照 12-13）。日人眼中的臺灣佛教徒極為重視現世利益，使得擅長以符水為病人祈禱的天理教、金光教等教派，較其他宗派受歡迎。此一現象，即使有許多日本宗派僧侶來臺布教，也難以撼動（丸井圭次郎 1926a，2-6；1926b，2-4）。基於此因，丸井圭治郎常以「臺灣佛教」為題，在南瀛佛教會舉辦的講習會進行演講（〈創設南瀛佛教會新店會館〉27）；其中常述及臺灣佛教寺院的供奉型態、早晚功課進行的方式、力主禪淨雙修的寺院僧侶、臺日彌陀淨土信仰相異等面向（臺灣總督府 20-21）。

臺灣僧侶即使有赴福建鼓山受戒者，仍多僅進行誦經禮拜，不善說法布教（臺灣總督府 72）。況且赴鼓山受戒之僧侶屬少數，佛寺僧徒多數是無學識之徒、晚年孤獨之身、貧困之士（臺灣總督府 74；臺南州共榮會 469）。如此情況，致使佛教僧侶社會地位低落，常招致世人之蔑視。日本來臺之佛教宗派認為，要能改善此況，勢必得建立正規的僧侶教育機制。因之，曹洞宗臺北別院於大正 6 年（1917）成立臺灣佛教中學林；臨濟宗妙心寺派也於同年，於臺北創辦臨濟宗鎮南學林；淨土宗同年 4 月則於臺南開設臺南學堂（釋慧嚴 1997，87；江燦騰 1997，121-125）。

南瀛佛教會的總部設於總督府內務局社寺課；至大正 13 年（1924）9 月 1 日修正會則，始於各地成立支部（〈制定支部規則〉25-26）。會長由總督府文教局局長擔任，副會長由文教局社會課長擔任、顧問由理事推薦會長囑託；理事若干名，其中一名指定由社會課內社寺主任擔任，其他再由會員選舉（〈南瀛佛教會會則〉1）。南瀛佛教會所舉辦的講習會，皆由總督府社寺課長決定其講師的聘請、科目的

設定；講師的陣容中，除了極少數的臺灣人，如許林、善慧、本圓外，其他多為日本人。此外，社寺課長、當地的知事、教育課長等官方首長，亦常蒞臨講習會開會典禮或閉會典禮進行講話（釋慧嚴 1997，92）。

江燦騰認為「南瀛佛教會的成立，不論丸井如何熱心推動，乃至在成立後兼任會長，也無法改變它是屬於民間宗教團體的性質。」（江燦騰 1997，123）釋慧嚴則認為該會是一民間宗教團體，只是主控權操之在總督府文教局。南瀛佛教會的成立與運作，顯示總督府希望透過政治手段，主導臺灣佛教的變革（釋慧嚴 1997，92）。南瀛佛教會藉由舉辦巡迴講習會進行僧伽教育，講習會的科目，包含楞嚴心要、《法華經》、〈普門品〉、《心經》、《金剛經》、《阿彌陀經》、《維摩詰經》、〈大悲心陀羅尼〉、自力教及他力教、往生淨土之思想、大小乘及禪真髓、禪之安心立命、座禪義、通俗布教大意、禪海一滴、平等觀、社會事業、佛教東漸史、臺灣佛教等，涉及建立對於日常課誦經典的理解、身為布教使應有的知識修養等面向（闕正宗 2011，195-209）。南瀛佛教會的成立，一定程度地提昇臺灣佛教僧侶的知識水準，同時也促進臺灣本土佛教界涉入佛學教育工作，如江善慧於大正 13 年（1924）11 月 11 日在基隆靈泉寺創辦佛學院（〈基隆靈泉寺佛學院開院式〉 30）。而在日臺有心人士的推動下，更教育出一批活躍於教界與社會中之佛教青年。據調查報告所見，大正 14 年（1925）臺灣有六十一位佛教布教使，包含李添春、曾景來、高執德、莊名桂、董有為、吳瑞諸、李孝木、林秋梧等留學於日本的臺籍佛教菁英（〈臺灣之宗教狀況〉 36-38、〈總會記事〉 5-24）。

更重要的是，南瀛佛教會每年召開的總會，使得臺灣各

法派的領導人能夠共聚一堂，商討教界事務。當時教界人士，亦深感團結的重要性，在大正 13 年已有以之為基礎，進而統一臺灣佛教的呼聲（〈南瀛佛教會之沿革（續）〉 26-32）。由此可見，南瀛佛教會的成立，使得清代以來臺灣寺廟間互不聯絡的景況得以改變，成為一個超越宗派，能夠聯絡各寺廟，進而得以扮演推動佛教改革的機關（大場鑑次郎 2-3）。

三、《南瀛佛教》所見佛教改革倡議者

（一）立基於「儒釋同源」的佛教振興倡議

《南瀛佛教》是日治時期臺灣南瀛佛教會的機關刊物，自大正 12 年（1924）7 月起，發行機關報《南瀛佛教會會報》。其後自第五卷第一號（昭和 2 年〔1927〕1 月），改稱《南瀛佛教》；昭和 15 年（1940）6 月，南瀛佛教會改名臺灣佛教會，刊名亦自次年發行的第十九卷第二號，改稱《臺灣佛教》，最終於昭和 18 年（1943）12 月停刊（江木生 1943a，29-32）。自 1924 年 7 月至 1943 年 12 月，近二十年間，共出刊 21 卷 196 號。南瀛佛教會之會員，最多有近千人，但受限於經費，加上有逾三分之二的會員未繳交會費，因此，《南瀛佛教》的印量雖最多曾達 900 冊，但平均約印行 500-600 冊（江木生 1933，85）。

楊惠南指出，《南瀛佛教》的刊行目的主要包含「教育臺灣佛教僧俗」與「改革臺灣佛教現況」，刊登的文章則可分為以下幾類（楊惠南 2003，4-32）：

- A. 以「在家佛教」為主題的文章
- B. 與女性相關的論述

- C. 與馬克思主義相關的論述
- D. 宗教法規的介紹與評論
- E. 臺灣、中國、日本和南洋佛教的調查報告
- F. 與「皇民化」有關的文章
- G. 刊中「會報」與「雜報」兩欄中的佛教史料

觀察《南瀛佛教》初創時期，刊登的內容，以佛教義理教學為主。直至 1925 年初，在時任社寺課長兼南瀛佛教會會長的丸井圭治郎支持下，開展關於「佛教振興」的倡議與討論。1925 年時逢日本治臺三十週年，南瀛佛教會於此時展開佛教振興的倡議與討論，正是在此背景下，以將改革臺灣佛教做為治理臺灣的政績之一為前提，所做出的因應之道。

根據第三卷第二號〈懸賞論文發表〉所載，在第三卷第一號中，以「臺灣佛教振興策」為題，徵募懸賞論文，共得文三十餘通（〈懸賞論文發表〉 40-41）。後在林述三（1887-1957）評選後，經丸井圭治郎評定，列出「選外」一名與第一至十名的作品。此次徵文獲得選外的江雲松文，以及被評為第一至五名的傅幼懷、蔡敦輝、鄭卓雲、覺空子、蔡南樵等文，分別刊登於 1925 年 3、5 月發行的《南瀛佛教》第三卷第二、三號（江雲松 11-16；傅幼懷 1925a，17-20；蔡敦輝 20-24；覺空子 11-13；蔡南樵 13-15）。約莫同時，南瀛佛教會海山支部也以「佛教為裨益國家社會說」為題徵文，⁴得文五十餘篇（〈本會海山支部徵文發

⁴ 南瀛佛教會海山支部為設置於臺北州海山郡板橋庄（今新北市板橋區）的支部，成立於 1924 年 9 月，原稱「板橋支部」，後於 1925 年 3 月改稱「海山支部」。時任支部會長為劉蘭亭、副支部會長黃江柳（1886-?）、教務主任蔡敦輝。（〈新設南瀛佛教會板橋支部〉 25；

表〉26)。一樣由林述三評選，並於第三卷第四、五號刊出林述三擬文與第一至四名的子經、傅幼懷、陳祖舜、歐調蝠等文（林述三 1925，6-7；子經 7-9；傅幼懷 1925b，9-10；陳祖舜 10-11；歐調蝠 11-12）。

1925年初關於「臺灣佛教振興策」與「佛教為裨益國家社會說」的徵文專號，均由林述三評審，決定選文名次；林述三甚至還為「佛教為裨益國家社會說」擬文。

林述三，名纘，字述三，號怪癡、怪星、唐山客、蓬瀛一逸夫，以字行。祖籍福建同安，少時進入廈門玉屏書院就讀，潛心研讀經史子集，尤精詩學。十三歲隨父親林修渡海來臺，父親於臺北大稻埕設立私塾，授徒講學，林纘從父而學。二十六歲父歿，林述三承繼父志，設礪心齋書房，宣揚漢學，倡導文風。林述三喜吟詠，大正4年（1915）與張純甫、李騰嶽、歐劍窗等人，同於礪心齋書房創立「研社」，社員皆以「癡」為號；大正10年（1921）改組為「星社」，社員均以「星」為號。大正11年（1922）林述三召集礪心齋書房學員，創設「天籟吟社」。大正13年（1924），林述三與友人共創臺灣首份詩刊《臺灣詩報》（楊惠南 2019，130-131）。昭和6年（1931），與弟子吳紉秋創辦《藻香文藝》，因經濟困難於次年（1932）停刊。昭和10年（1935）創立《風月》，出任副主筆兼會計部長，常發表詩作、小說與詩話。此外，林述三曾任《臺灣詩報》、《南瀛佛教》、《亞光新報》編輯，《臺灣詩壇》、《詩文之友》顧問⁵。

〈板橋支部長指名〉26；〈板橋支部解稱及近況〉41-42；〈役員及教師補任免〉25；黃論語35；〈海山支部置揭示場〉34）

5 請參考臺灣文學館線上資料平臺，「林述三」。

《南瀛佛教》中，林述三之名始見於第一卷第二號，其後至第七卷第四號，都可見林述三選詩的紀錄。而在《南瀛佛教》第六卷第一號、六卷第四號、第七卷第一號，均可見林述三與江木生共同署名，以「《南瀛佛教》編輯處 / 編輯室」為名義發出的新年或夏期間候（林述三 1927，6；1928，72；1929，18）。然而，在「《南瀛佛教》創刊十週年紀念號」（第十一卷第七號）刊載的〈歷代本誌編輯者〉中，第一卷第一號（1923年7月）至第七卷第四號（1929年7月）的編輯者為江本生（即江木生），並未見林述三之名。第七卷第五號之後，則由臺中佛教會的林德林接任（〈歷代本誌編輯者〉11）。

根據郭貞孜的研究，林述三可能是由第一卷第二號（1923年9月）至第七卷第四號（1929年7月），擔任《南瀛佛教》的編輯主任（郭貞孜4）。在林述三擔任編輯期間，長期負責古詩選編的工作。另外，可以見到刊登關於臺灣佛教之弊病、振興、改革等議題的文章共三十一篇（其中包含上述二次徵文相關作品十一篇）。

表 1：大正十四年（1925）南瀛佛教會、海山支部徵文入選作品表

南瀛佛教會「臺灣佛教振興策」			海山支部「佛教為裨益國家社會說」		
名次	出身	姓名	名次	出身	姓名
選外	臺北	江雲松	—		
第一名	臺南	傅幼懷	第一名	宜蘭	子經
第二名	臺北	蔡敦輝	第二名	臺南	傅幼懷
第三名	臺南	鄭卓雲	第三名	基隆	陳祖舜
第四名	臺北	覺空子	第四名	臺南	歐調蝠
第五名	臺南	蔡南樵	第五名	新營	何半惺
第六名	中壢	劉金標	第六名	臺南	維周
第七名	員林	高執德	第七名	新營	何半惺

第八名	彰化	蔡氏禪旨	第八名	鹿港	陳湛恩
第九名	新竹	周田	第九名	鹿港	竹園生
第十名	中壢	曾芝芳	第十名	彰化	桂園居士

觀察林述三評選的二次徵文之獲選作者，有些特出之處。首先，二次徵文獲選共十九人，其中包含江雲松、傅幼懷、蔡敦輝（?-1936）、蔡南樵、蔡旨禪（1900-1958。誤植為蔡氏禪旨）、曾芝芳（1900-?）（曾芝芳 1924a，5；1919，11-12；林進發 501-502；原幹洲 1931，75；1936，292；顧敏耀 2011，80）、何半惺（何半醒）（連橫 4）、陳湛恩（1868-1926）等人，除參加南瀛佛教會的徵文外，另多有詩文發表，多為活躍於日治時期的臺灣文壇者。

傅幼懷為臺南的西山吟社成員（〈西山吟社擊鉢錄——潛水艇〉 14；〈西山吟社擊鉢錄〉 8）；蔡南樵是臺南南社成員（許丙丁 9）；蔡旨禪被譽為日治時期的才女，兼具塾師、詩人、畫家、齋女身分（葉連鵬 2；魏秀玲 14）；蔡敦輝主要以擔任《臺灣新聞》記者為業，師事著名詩人林馨蘭（1870-1923），曾為其搜輯遺詩為《湘沅吟草》，為臺北瀛社、淡北吟社、板橋吟社（臺灣記憶）、中和吟社的成員（顧敏耀 2012，59），同時熱心佛教推廣，曾經擔任南瀛佛教會講師（〈南瀛佛教講習〉 4；闕正宗 2011，197），也協助淨土真宗的王兆麟（1887-1963）在臺北宣教（闕正宗 2014a，37、54-55）；陳湛恩則是中部鹿苑吟社、大冶吟社成員，並多次參與「崇文社」的徵文。

南瀛佛教會二次關於佛教振興的徵文，共收文逾九十篇，獲選文章中，有超過三分之一的作者同時具有北中南詩社的成員身分；而負責評選的林述三當時亦活躍於臺灣古典詩壇，曾被聘為板橋吟社評選詩作之詞宗，與蔡敦輝同為臺

北詩壇成員（顧敏耀 2012，59）。前人關注日治時期地方文人與詩社、文社的積極活動，多已指出其間蘊涵著保存傳統漢文化與提倡儒家思想的意識（黃美娥 81-119；江寶鈺 81-118）。與此同時，日本政府亦運用臺灣儒教思想及漢文資源，探尋治臺的策略與助力，進而促進日、臺之間的文化統合。⁶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人物多出生成長於清末，從青年到壯年階段，歷經清朝至日本的政權轉換。面對世局變化，他們被迫兼具不同文化傳統與思想觀念的「遺民」與「新民」身分，「對於居處其間的臺人而言，自然特別能意識到前所未有的『變化』，這意識乃來自於殖民性（coloniality）、本土性（nativity）與現代性（modernity）衝擊所導致的精神感應。」進而衍生出一套應世法則（黃美娥 81）。由此觀察這些參加關於臺灣佛教振興與佛教利益社會徵文的文人，他們並非僅僅是基於對於佛教的關心而發聲，更重要的是在其面對世變，思考己身與漢文化的處境，所做出的一系列思辯與因應。參與詩社、文社的活動，乃至於南瀛佛教會的徵文活動，均是在此景況之下出現的一系列作為。

上列人物中的陳湛恩與曾芝芳二人，即常參與對於傳統文化、社會議題與改革的相關徵文活動。

陳湛恩，字材洋，清彰化鹿港人，縣學生員。明治 30 年（1897）加入鹿港、苑里兩地士紳所組成的「鹿苑吟社」。明治 32 年（1899）起，擔任臺中廳下埔姜崙公學校教員，大正 3 年（1914）期滿十五年，獲頒褒狀及徽章。大正 6 年（1917）「櫟社」之鹿港籍成員陳懷澄、莊太岳、

⁶ 相關研究可參考駒込武、陳培豐、柳書琴、黃美娥、川路祥代等人之研究成果。

施家本等，於鹿港創「大治吟社」，推陳湛恩為顧問⁷。陳湛恩詩文造詣深厚，亦好與徵文，曾多次參與臺灣文社的徵文（陳湛恩 1919，64-65；1920a，24-25；1920b，23-24；1920c，30-32；1921，33-34；1922，7）。另外，陳湛恩亦積極參與崇文社徵文活動，於大正 8 年至 10 年間（1919-1921），共有九篇文章入選彰化「崇文社」徵文，包含〈撫蕃策〉、〈義務與權利並行論〉、〈家庭教育論〉等，其中，〈戒訟說〉、〈開拓實業策〉更獲第一名殊榮（蘇秀鈴 264-285）。

曾芝芳出身新屋庄大坡（今桃園市新屋區），曾任大坡區總代、保甲聯合會長、大坡信組常務理事、新屋庄協議會員、楊梅軌道會社大坡發著所顧問（林進發 501-502；原幹洲 1931，75；1936，80；顧敏耀 2011，71-99）。在參加南瀛佛教會 1925 年舉辦的徵文前，曾芝芳曾於 1919 年參加臺灣文社舉辦的「韓信論」徵文，並被評選為第十三名（曾芝芳 1919，43-44）；1920 年參加「張良論」徵文，被評選為第十五名（曾芝芳 1920，49-50）；1921 年參加「釋教論」，被評選為第五名（曾芝芳 1921，4-5）；1922 年再參加「東漢黨錮論」徵文，被評選為第九名（曾芝芳 1922，7）；1924 年也參加「田橫論」徵文，被選為第七名（曾芝芳 1924b，7）。

日治時期詩社、文社徵詩、徵文活動盛行，各地文人亦多透過參與相關活動，展現自我的意識與文采。《南瀛佛教》最初的編輯事務由活躍於北部文壇的林述三主持，亦將文壇徵詩、徵文之風帶入《南瀛佛教》之中。觀察由其負責

7 請參考臺灣文學館線上資料平臺，「陳湛恩」。

評選的二次涉及佛教振興的選文作者，亦多具有積極參與臺灣文壇身分，具體反映出前述跨越清日統治時期臺灣文人，在面臨政治、文化、思想的舊新交替時所做出的因應與思考。其中也不乏如蔡敦輝、蔡旨禪等，具有活躍於佛教或齋教群體者。

其次，這兩次徵文活動入選的文章，已可見本土佛教青年的發聲，如高執德（1896-1955）、鄭卓雲。據大野育子研究，高執德出身彰化，大正6年（1917）進入「台中州教員養成講習所」，隔年擔任公學校教員。大正13年（1924）辭去公學校教員一職，大正15年（1926）擔任員林郡社會教化囑託。後出家於大湖法雲寺，法號證光；1926年赴日駒澤大學佛教科專門部求學，1930年返臺（闕正宗、蘇瑞鏘 256；大野育子 41、58-59）。其於1925年參加「臺灣佛教振興策」徵文時，是其離開公學校教職後至出家前之事。鄭卓雲後曾任開元寺書記，曾於昭和5年（1930）編纂《臺灣開元寺誌略稿》，以及開元寺僧人傳記，為臺南開元寺留下重要歷史記載（鄭卓雲 1931a，24-27；1931b，29-31；1931c，19-20）。

1926年《南瀛佛教》仍持續刊登佛教改革相關文章，特別是在1925年11至12月應林覺力（1881-1933）、羅妙吉（1903-）邀請中國「佛化新青年會」代表張宗載（1896-？）、甯達蘊（1901-？）、道階等人來臺前後（〈來臺中華僧一行〉4；江燦騰 2001，300-306；闕正宗 2012a，9），陸續刊登張宗載所撰之〈佛教的社會主義〉、〈吾人何故信佛教乎？何謂學佛乎？〉、〈春與佛之使命〉、〈我對於東亞佛教信徒今後之希望〉、〈今後真佛教之產生與東亞民族之努力〉、〈新佛化運動與中日親善之實現〉、〈支那佛教徒革命宣言〉（善雄（張宗載筆名）1925a，8-10；1925b，

16-17；1926a，19-20；1926b，14-15；張宗載 1926a，7-9；1926b，28-30；1926c，26-28；1926d，21-22），以及甯達蘊〈佛法與人生〉、〈佛家大乘小乘之比較〉、〈佛教的社會化〉等文（甯達蘊 1926a，9-10；1926b，12-16；1927，32-37）。江燦騰認為，隨著淨空、張宗載、甯達蘊等中華佛化青年會相關成員的文章刊載在《南瀛佛教》上，與佛化新青年會在中國的活動受挫，期盼能與臺灣佛教界建立聯繫有關。而在基隆月眉山靈泉寺住持江善慧、曾受業淨空居士杜鵑啼門下的臺籍僧侶林玠宗（1897-1987）之引介與支持下，對於張宗載等人重視在家眾、行新佛化、批舊僧的主張有所共鳴（江燦騰 2001，309-321）。

尤其是林玠宗，在此脈絡下於 1926 年底在《南瀛佛教》第四卷第六號發表〈佛化新僧之宣言〉及，主張自己從今爾後「亦僧亦俗亦儒亦道」，號為「新僧」（1926a，23），並提出〈佛化新僧簡章〉（1926b，23-24）：

1. 作佛化運動的新生活，行大乘菩薩的方便法，在社會經營一切利益眾生事業。
2. 離開虛偽的舊佛教，以行真實的新佛化。
3. 本佛陀慈悲喜捨為宏法中心，不分宗派門戶，自起鬥爭。
4. 新僧，分真俗二派：（1）獨身，持守法五戒。（2）帶妻，聽人自便。
5. 傳教方法，亦同耶穌教之組織，以期遍行正法、社會群眾。
6. 傳教的人，不限素食葷食，唯不可自殺生命以為美食。

隨著林玠宗的宣言，其在出家前的妻子陳雍，也發表〈陳雍女士宣言〉，支持林玠宗「新僧」、「通俗佛教」的主張（陳雍 24）。江燦騰認為陳雍之信仰宣告書所展現的觀念，確實受到張宗載等佛化新青年會的激發，但問題意識完全是臺灣佛教所自有（江燦騰 2001，318）。值得注意的是，陳雍宣言中，直言：

名之新僧，可追日本真宗之步；號曰通俗佛教，能去佛門敗德之人。

陳雍將玠宗所倡之「新僧」，比為追隨日本淨土真宗的腳步；而玠宗在其宣言中，自稱「亦僧亦俗亦儒亦道」，則是相對於淨土真宗宗祖親鸞自詡之「非僧非俗」。事實上，林玠宗的佛化新僧思想，主要是受到佛化新青年會之影響（蘇全正 249）；而陳雍的宣言提出淨土真宗與基督教的馬丁路德，主要也是為了強調林玠宗「新僧」主張中的「帶妻」之合理性。但由陳雍舉出「追日本真宗之步」，亦已可見日本佛教在隨著殖民政府進入臺灣後，對於當時臺灣人的佛教認知，開始產生影響。

由上所述可知，自 1925 至 1926 年，在《南瀛佛教》第三、四卷中可見一系列關於佛教振興與改革的文章，一部分是臺灣本土儒士文人與青年僧侶在世變之下，亟思振興與改革佛教所舉之主張，一部分則是在此意識下，借鏡中國對於佛教改革的思考，以供臺灣佛教界與相關人士參考。背後的推動者，有接受傳統中國思想文化教育而成的文人，如林述三、蔡敦輝等活躍於當時文壇上的人士；以及如江善慧、林玠宗、羅妙吉等，赴閩南受戒、習禪、求學於佛學院者。

翁聖峰指出，「儒釋同源」是日治時期受到傳統儒學

教育影響的臺灣知識分子重要的觀念，儒者為維持倫常秩序，對於所謂的佛教亂象有必要提出檢討、批判（翁聖峰 93）。觀察此階段發聲倡議佛教改革者之論述，確實主要仍立基於儒家思想與漢傳佛教傳統價值觀，以檢討當時臺灣佛教界中存在的諸多亂象，期能振衰起敝。此與後來在 1932 年 10 月《南瀛佛教》再發行的「臺灣佛教改革號」（第十卷第八號），從主導者到發聲者，乃至於對於佛教改革的倡議，均存在著根本性的差異。其間變化，可由《南瀛佛教》編輯主任的更替查其端倪。

（二）延續日本新佛教運動的改革倡議

《南瀛佛教》第七卷第五號中，以繫時於昭和 4 年（1929）10 月的〈急告！！（請一讀）〉一文，公告更換編輯負責單位之事：

此次因為事務取扱等的關係，得會長及副會長的許允，便宜上將會誌「南瀛佛教」編輯部—編輯、印刷、發行—委託臺中佛教會營辦。惟是寄稿、通信，乃至關於會員、會計等的事務取扱，依然請與本會接洽。

與此同時，南瀛佛教會的會長也由石黑英彥（1884-1845）更替為杉本良（1887-1988）（〈送迎新舊兩會長之辭〉4）。根據闕正宗之研究，南瀛佛教會會長對於會務的推動有真正的決策權。自第一任丸井圭治郎（任期 1921.4-1924.12）、第二任木下信（任期 1925.2-1927.4）、第三任石黑英彥（任期 1927.4-1929.8），主要的任務由奠定基礎、結成會員，過渡到啟動第二次宗教調查，確立社寺行政基礎，並推動寺廟財產制與聯絡制。第四任會長杉本良

（任期 1929.8-1931.5）時期，則是發動宗教改革，去除神佛不分現象，並尋求臺灣佛教之統一（闕正宗 2011，207-208）。在杉本良的帶領下，南瀛佛教會著手推動參考日本佛教本末寺制的佛教「統一」，以及針對僧伽教育、管理人制度、僧侶食肉帶妻等方面的「改革」（闕正宗 2011，220-224）。

前引〈急告！！（請一讀）〉一文中所指接替營辦編輯部的臺中佛教會，創立於大正 11 年（1922），傳道事務由林德林負責（遠藤所六等 722-723）。林德林，出身北港，俗名茂成，筆名有正信生、二樹庵、祇園等。明治 45 年（1912）參與基隆靈泉禪寺舉辦的愛國佛教講習會，後拜江善慧為師而出家，法名德林（江燦騰 2001，386-387）。大正 6 年（1917）進入曹洞宗臺灣佛教中學林就讀，大正 9 年（1920）畢業後，受林超英聘請，於臺中地區舉辦三個月的講習會，備受好評。其後在林超英、林列堂、林澄波、張江中等人士的支持下，籌辦布道機構，並於大正 11 年（1922）起建竣工，再於大正 12 年（1923）1 月，由曹洞宗管長圓證明修禪師北野元峰主持，舉行釋迦如來本尊的入佛式（遠藤所六等 723；釋慧嚴 2008，579-583）。

林德林主持臺中佛教會，除推動布教事務外，還出版《中道》雜誌（大正 12 年〔1913〕11 月 1 日創刊），此刊目的在於「欲使人人得信仰之精神，解佛法之真義，故用普及宣傳法，以圖士農工商職中，可得真佛教」（林澄波 1925，10；釋慧嚴 2008，587）。林德林對於佛教的見解與看法，主要展現在《中道》中的文章。闕正宗指出，根據林德林親撰〈家庭道德講話〉，以及許多談論佛法與家庭關係的文章，顯示《中道》創刊主旨之一，在於提倡佛化家庭（闕正宗 2022b，281）。

做為被曹洞宗管長視為「臺灣佛教教育中心地」之一的臺中佛教會住持（林澄波 1913，10；曾普信 6-7），林德林在大正 12 年 7 月發行的《南瀛佛教》創刊卷中發表〈佛教之起源〉後，要到昭和 4 年（1929）3 月出刊的第七卷第二號，才能再見到其文章。其後林德林自同年 10 月出版的第七卷第五號起，接任負責《南瀛佛教》的編輯工作。而在昭和 2 年（1927），發生圍繞著林德林而發生的「中教事件」，進而引發以彰化崇文社儒生社群為中心對於林德林與佛教界的批判，乃至於臺灣佛教界與儒生社群之間的論戰。⁸

林德林之後，陸續由李添春、高執德、曾景來等留學日本駒澤大學的青年「佛教菁英」擔任《南瀛佛教》的編輯者；直至昭和 15 年（1940），在皇民化運動下，改由東京大學印度哲學系畢業來臺被任命為「敬神教化指導者講習會書記」的臺灣總督府囑託田村智友（父親為淨土宗臺北別院院主田村智學）擔任編輯，至昭和 18 年（1943）12 月 4 月第二十一卷第四號（田村智友）；後又有也畢業於駒澤大學的竹中英貴（黃英貴）擔任，直至昭和 18 年 12 月第二十一卷第十二號停刊（闕正宗 2022b，278-280）。

⁸ 關於中教事件的相關研究，以江燦騰之討論最為詳細（江燦騰 2000a，9-80；2001，367-488；2002，255-303）。

表 2：《南瀛佛教會會報》/《臺灣佛教》編輯者（江木生 1943b，39）

刊名	編輯者	卷期 / 時間
《南瀛佛教會會報》 大正 12 年〔1923〕7 月至昭和元年〔1925〕12 月 第 1 卷第 1 號至第 4 卷第 6 號	林述三 江木生 (江木生)	第 1 卷第 1 號（大正 12 年 7 月）至第 7 卷第 4 號（昭和 4 年〔1929〕7 月）
	林德林	第 7 卷第 5 號（昭和 4 年〔1929〕10 月）至第 8 卷第 5 號（昭和 5 年〔1930〕11 月）
《南瀛佛教》 昭和 2 年 1 月至昭和 16 年〔1941〕元月 第 5 卷第 1 號至第 19 卷第 1 號	李添春	第 9 卷第 1 號（昭和 6 年〔1931〕1 月）至第 10 卷第 2 號（昭和 7 年〔1932〕4 月）
	高執德	第 10 卷第 4 號（昭和 7 年〔1932〕5 月）至第 10 卷第 7 號（昭和 7 年 8 月）
	江木生	第 10 卷第 8 號（昭和 7 年 10 月）
	曾景來	第 10 卷第 9 號（昭和 7 年 12 月）至第 18 卷第 2 號（昭和 15 年〔1940〕2 月）
	江木生	第 18 卷第 3 號（昭和 15 年 3 月）至第 18 卷第 4 號（昭和 15 年 4 月）
	田村智友	第 18 卷第 5 號（昭和 15 年 5 月）至第 21 卷第 3 號（昭和 18 年〔1943〕3 月）
	《臺灣佛教》 昭和 16 年 2 月至昭和 18 年 12 月 第 19 卷第 2 號至第 21 卷第 12 號	江木生
竹中英貴		第 21 卷第 6 號（昭和 18 年 6 月）至第 21 卷第 12 號（昭和 18 年 12 月）

昭和時代，由駒澤大學畢業返臺的「佛教菁英」和南瀛佛教會的關係相當密切。昭和3年（1928）駒澤大學第一位臺灣畢業生返臺以前，南瀛佛教會的「理事」、「幹事」以及「教師」、「教師補」等職位均由江善慧、沈本圓、林覺力、林永定等「本土傳統僧侶」出任，昭和3年以後，曾景來、李添春、高執德、林秋梧等新「佛教菁英」，被任命為「教師」之職，也陸續成為《南瀛佛教》的編輯者。

因之，林德林接任《南瀛佛教》的編輯工作前後，《南瀛佛教》中可見之佛教改革倡議者，轉而以包含林秋梧、李添春、曾景來、高執德等曾留學駒澤大學者為主（闕正宗 2012b, 124），以及可能參與他們主講之講習會，受其思想言論影響者（如張成霖、臺南開元寺僧曾復妙、林徹妙、鄭卓雲等），兼及日本佛教宗派在臺布教師。

昭和7年（1932）10月《南瀛佛教》發行「臺灣佛教改革號」，源於南瀛佛教會於8月發給臺灣寺院之公文，說明：

本會機關雜誌南瀛佛教……來九月號預定發行「臺灣佛教改革號」……為指導臺灣佛教僧侶及齋友等之宏願及聲援之意味，貴師對於臺灣佛教將來進展之方策及從來之缺點應改革處……等，貴意如何，請勿客氣。發表於本誌紙上，是不獨本誌之光榮，及為臺灣佛教之貢獻亦不尠（林德林 1932, 46-48）。

該期主編江木生在〈卷頭言〉指出當時臺灣佛教中的缺陷及弊害之主要事項，包含 1. 臺灣的寺院之間幾乎沒有聯絡關係，毫無管理地存在於各地方；2. 師徒之間只是形式上的授法，造成有力的佛教徒稀少；3. 缺乏管理的寺院與地

位低的徒眾甚多，有八、九成的寺院實權不在住持，而是把持在信徒手中。因之，「為了臺灣佛教的提昇，斷然實行某種適切的改革已迫在眉捷」，而有此改革號的出刊（江木生 1932，1）。此「臺灣佛教改革號」刊登倡議改革文章與作者詳列如下：

表 3：《南瀛佛教》「臺灣佛教改革號」倡議佛教改革文章

序號	篇名	作者	身分	頁數
1	卷頭言	江木生	《南瀛佛教》主編 臺灣總督府內務局 文教課雇員	1
2	臺灣佛教改革に對する愚見	芝原玄超	淨土真宗本願寺派 本願寺輪值	2-3
3	余の見たる臺灣の舊慣と宗教 附佛教將來の施設	高林玄寶	臨濟宗妙心寺派臺 灣布教會監督	4-12
4	改革に因み希望二則	大野鳳洲	曹洞宗臺北別院主	13-14
5	臺灣佛教界の現状を一瞥して 所感を述べんとす	勝見榮明	日蓮宗布教師	14-17
6	先づ僧侶の素質向上を計れ	田村智學	淨土宗臺北別院主	18-19
7	臺灣佛教界に對する所感	中野全能	淨土宗西山深草派 臺灣開教總監	20-21
8	臺灣佛教の振興に就いて	東海宜誠	臨濟宗妙心寺派開 教使	22-26
9	臺灣佛教の發展策	佐久間尚 孝	曹洞宗新竹寺住持	26-29
10	臺灣佛教の革新について	高橋良誠	淨土真宗本願寺派 本願寺布教使 真宗崇佛會顧問	30-32
11	臺灣佛教界に對する所感	河野義雄	臨濟宗妙心寺派最 勝禪寺住持	33-34
12	臺灣佛教改革に就いて	王兆麟	留學龍谷大學 臺南彌陀寺住持 淨土真宗本願寺派 布教使	34-35

13	臺灣宗教會設立の提唱	曾景來	駒澤大學畢業 總督府囑託	36-38
14	臺灣佛教改革號發刊に就いて	江木生	《南瀛佛教》主編 臺灣總督府內務局 文教課雇員	38-42
15	韋駄天尊者が臺灣教界の改革を叫び給ふ	革新生		43
16	臺灣佛教改革反側觀	毒雲		43-44
17	改革上之方法及其他問題	江善慧	基隆靈泉寺住職	45-46
18	臺灣佛教改革前提	林德林	曹洞宗臺灣佛教中 學林畢業 臺中佛教會館主	46-48
19	臺灣佛教的進展和改革有什麼方策呢？	鄭羅漢		49-51
20	臺灣佛教之振興	林覺力	苗栗法雲寺住職	52
21	造成財產	沈德融	曹洞宗第一學林畢業 曹洞宗中學林學監	53
22	提案一則	曾景來	駒澤大學畢業 總督府囑託	54-55
23	對於臺灣佛教之批評與感想	愛佛	毘盧禪寺	56-61
24	很多迷信的臺灣	孫心源		61-62
25	曉鐘	吳標		62-63
26	對臺灣佛教改革之喊聲	編輯者		64-66

此次徵文發表人，包含日本佛教駐臺僧侶與臺籍僧侶，而臺籍僧侶亦以與日本在臺佛教宗派關係密切者為主。日本佛教駐臺僧侶有淨土真宗本願寺派僧二人、臨濟宗妙心寺派三人、曹洞宗二人、日蓮宗一人、淨土宗二人，共計十人。臺灣佛教人士共有十三人發表，其中包含本土法派領導人基隆靈泉寺江善慧、苗栗法雲寺林覺力、曹洞宗兩大本山臺灣別院孫心源；接受日本佛教教育的林德林；留學日本的佛教菁英淨土真宗王兆麟、曹洞宗曾景來、沈德融等三人。無論日本僧侶或臺籍僧侶，在「臺灣佛教改革號」中述及之

臺灣佛教問題，不脫前文江木生所述狀況。而關於改革方向，則包含透過教育提昇僧侶素質（田村志學 18-19；東海宜誠 22-26；愛佛 56-61）、建立統一組織（佐久間尚孝 26-28；曾景來 1932，36-38；林德林 1932，46-48）、革除迷信等（芝原玄超 2-3；勝見榮明 14-17；王兆麟 34-35；吳標 62-63）。

相較於 1925 年初關於「臺灣佛教振興策」與「佛教為裨益國家社會說」的徵文專號以臺籍儒佛菁英為主，七年後進入昭和時期，關於臺灣佛教改革的徵文，幾乎均由與日本佛教關係密切的佛教人士撰文發表。關於佛教改革的倡議，則是由立基於儒家思想與漢傳佛教傳統價值觀，以檢討當時臺灣佛教界中存在的諸多亂象，期能振衰起敝，轉而關注臺灣佛教寺院分立、未能合一、僧侶教育、僧侶地位低下、寺院管理不善、迷信等問題。

爾後，有更多接受日本佛教教育的佛教菁英，在《南瀛佛教》發表關於佛教改革的文章：

表 4：《南瀛佛教》佛教改革倡議者⁹

姓名	篇數	姓名	篇數	姓名	篇數
江雲松	1	傅幼懷	2	蔡敦輝	1
鄭卓雲 / 鄭羅漢	4	覺空子	1	蔡南樵	1
釋溪聲	1	子經	1	陳祖舜	1
歐調蝠	1	林述三	1	許林	1
林希仲	1	洪和尚	1	林秋梧	3
水上興基	1	曾復妙	3	常諦	1

⁹ 根據《南瀛佛教》與闕正宗之研究增補整理（闕正宗 2011，236-239）。

李添春	3	林德林 (正信生、祇園)	3	曾景來	4
張成霖	3	KC 生	1	張寬蒼	3
釋雲明	1	吳玉真	1	法雨	1
蘭雲	1	林瓊淵	1	南山生	1
陳雲卿	1	CH 生	1	金剛居士	1
道猷	1	芝原玄超	1	大野鳳洲	1
勝見榮明	1	田村智學	1	中野全能	1
東海宜誠	1	佐久間尚孝	1	高橋良誠	1
河野義雄	1	王兆麟	1	江木生	1
革新生	1	毒雲	1	江善慧	1
曾永成	1	林覺力	1	沈德融	1
愛佛	1	孫心源	1	吳標	1
好笑僧	1	曾殊一	1	張妙禪	1
劉達玄	1	吳敏敦	1	大覺	1
林徹妙	1	釋無上	1	陳普河	1
張宏道	1	林眼淨	1	曾真常	1
曾達虛	1	釋隱西	1	賴曉妙	1
施斌宗	1	村野孝顯	1	李焰灶	1
張玄達	1	寶月圓光	1		

觀察昭和時期在《南瀛佛教》中可見的佛教改革呼聲，有幾個較為突出的特點：

首先，倡議佛教改革者，轉以出生、成長於日治時期的新世代青年僧侶為主。這些以林德林與駒澤大學培養的臺籍佛教菁英為首的青年僧侶，所接受的佛教教育與觀念，不少是隨著日本佛教宗派、南瀛佛教會講習會等在臺教育事業的開展而建立。

其次，出現應為弘法利世的「新僧」/「新佛教」主張，有別於堅守學作餓口、燒庫錢、送葬等舊慣習的「舊僧」/「舊佛教」（林徹妙 20）。這些「新僧」強力批判迷

信、離世、以經懺自活、重視寺產、分裂相爭的舊佛教；他們力主改革，認為應向社會布教，發揮大乘佛教精神；更有部分接受日式佛教觀念者，支持僧尼能食肉結婚。

再者，有部分倡議者，如張寬蒼、曾達虛、施斌宗等，則是留學中國佛學院者，其佛教改革思想主要是受到太虛一系之影響。值得注意的是，太虛的佛教革新運動，也受到日本佛教的影響；而且其對於「日本經驗」的尋找，是始於 1917 年接受善慧的邀請來臺訪問，並獲善慧應允陪伴下，轉赴日本訪問¹⁰。根據何燕生的考察，太虛在臺期間，先透過訪問「臺灣佛教中學林」的日本曹洞宗教師，對於近代日本佛教的改革與布教發展有了基本認識（何燕生 190-194）。從太虛所撰《東瀛采真錄》中之記載可知，太虛的臺灣、日本行，使其對於日本佛教在海外的傳教、宗派寺院的營運管理、僧伽制度、組織團體、佛教教育與研究等情況，均有所了解。而其於自傳中，更直言：「日本佛教很多與我的僧伽制度論吻合之處」¹¹、「此遊的成果，即證明了我所作的整理僧伽制度論，如分宗組織等確與維新以來之日本佛教堪相印合」¹²。由此看來，原本對於中國佛教改革就有一番理論與思考的太虛，在赴日後，有了參考與對照的依據，進而推動在中國的革新活動。

林德林在接任《南瀛佛教》編務前，同年 7 月初至 9 月 5 日到中國大陸視察福建、廣東、江浙重要寺院及僧侶，後由朝鮮半島歸臺。其後於 1929 年 9 月出刊的《中道》第六十九號，發表〈臺灣佛教：新運動先聲〉一文，列舉臺灣佛

¹⁰ 《太虛大師全書》，CBETA 2025. R1, TX 29, no. 19, pp. 220a-221a。

¹¹ 《太虛大師全書》，CBETA 2025. R1, TX 29, no. 19, p. 84a。

¹² 《太虛大師全書》，CBETA 2025. R1, TX 29, no. 19, p. 224a。

教十項須改革之「流弊」：1. 寺院制度的不良、2. 方丈長老的閒逸、3. 僧伽教育的缺點、4. 應酬佛事的稗販、5. 僧伽信仰的錯謬、6. 山林寺院的消極、7. 雲水生活的放縱、8. 神佛混合的無格、9. 剃度受戒的氾濫、10. 教徒思想的腐化。這些皆是臺灣佛教本身的問題，尤其是佛教制度問題。林德林針對此「流弊」提出的十二項對策，關於寺院制度、住持的行事、僧伽教育、應酬佛事、神佛混合等問題，幾乎同於日本新佛教徒們的主張（詳如後述）；而「整理教規寺規」與「僧伽制度改善」，則可能是呼應太虛的改革所舉。¹³

江燦騰、釋慧嚴、闕正宗等前輩學者，均已指出日本曹洞宗在臺培養的佛教菁英，在臺灣的新佛教運動中，扮演領導的角色，對於當時的「新僧」/「新佛教徒」之意識與認同，具有重要的影響。此外，部分赴中國佛學院求學者，則受到太虛所推動的佛教改革之影響。如曾經留學太虛武昌佛學院的法雲寺派僧人羅妙吉，回臺後組織「臺灣宗教革新會」，提倡：1. 打破不合時勢的迷信、2. 宣傳真正的大乘法理、3. 肅清敗類的教徒、4. 養成科哲的人才、5. 進行有益民生的主義、6. 喚醒島民的癡愚大夢、7. 實踐大同平等的幸福，呼應太虛佛教改革的倡議。¹⁴ 筆者則認為，關於日治時期臺灣新佛教運動的發展，亦應該進一步將之置於以日本為首的近代東亞新佛教運動發展的脈絡來觀察。

近代日本的佛教改革運動，始於明治時期對於「舊佛教」的批判與反省。明治 20 年代以降，以重視個人內在信仰的「信仰中心主義」，成為自明治中期井上圓了（1858-1919，哲學館創辦者）、中西牛郎（1859-1930）、古河老

¹³ 林德林 1929，1-2。感謝審查委員提示寶貴修改意見。

¹⁴ 闕正宗 2012a，12。感謝審查委員提示寶貴修改意見。

川（勇，1871-1899）與反省會、清澤滿之（1863-1903。浩浩洞精神主義提倡領導者），明治後期新佛教徒同志會，大正中後期至昭和後妹尾義郎與新興佛教青年同盟會等佛教改革者，所共同追求與論述的「佛教」觀（大谷榮一 43-44；林韻柔 177）。

其中，以境野黃洋（1871-1933）、高嶋米峰（1875-1949）為領導的「新佛教徒同志會」，透過著書、雜誌之出版、巡迴宣講等途徑，推動以自由研究為方法確立「新信仰」的新佛教運動（福嶋信吉 119）。新佛教徒追求的信仰的自由、思想的自由、良心的自由，並致力於在實際的生活中實現。為達到此目的，新佛教徒主張應該進行自由研究、合理的信仰與信仰活動（境野黃洋 1910，6-7）。自由研究的精神，在於體現佛教的根本原理，並探求符合現時社會需求之道，了解佛教面對現時社會的不足與如何補足，從而使佛教能夠重新再造為符合未來世界需要的新信仰（境野黃洋 1910，15-17）。

新佛教徒同志會成員自稱 / 自認有別於舊佛教的「新佛教徒」，強調自己的立場，「雖自視為反對舊佛教的佛教改革者，但非全然地專以破壞舊佛教為志，而是寧可以新信仰的建設者與鼓吹者自居」。「新佛教」的目標是消弭從舊佛教而來的迷信、俗信，從而建立基於理性理解佛教義理與歷史事實而來的「新信仰」，並基於此一目標推動一系列「復興 / 振興」佛教的舉措。他們基於批判「具有朽腐習慣的舊佛教」，務求革新只在意面對木像佛畫唱名念佛「圖具瀕死形式的舊佛教」、只期待現世利益的「迷信舊佛教」、只強調來世却絲毫不管現實世界義務與正義的「厭世的舊佛教」，以及實際上並未實踐佛教教義的「空想的舊佛教」（〈我徒の宣言〉 1-5；林韻柔 188）。

在新佛教徒同志會的機關刊物《新佛教》創刊號中揭載的〈我輩宣言〉，體現出「新佛教」與「舊佛教」的區隔（〈我徒の宣言〉 1-5）：

1. 我輩堅持以對佛教的健全之信仰為根本要義。
2. 我輩力主基於信仰智識與義理之振興普及，致力於改善社會的根本。
3. 我輩主張佛教應與其他宗教進行自由研究。
4. 我輩期能消滅迷信。
5. 我輩不認為應該維持傳統的宗教制度與儀式。
6. 我輩強烈排斥政治對於宗教的保護與干涉。

由此可見，新佛教徒們所認知的「舊佛教」，是「習慣的舊佛教」、「迷信的舊佛教」、「厭世的佛教」、「空想的舊佛教」。「新佛教徒」重視內在的「信仰」，並據之致力於社會的改善；他們主張應該抱持批判、研究的態度進行宗教間的討論，反對傳統的宗教制度、儀式與迷信，強調宗教應自立於政治權力的干涉之外。新佛教徒大聲疾呼反對重視超自然、虛幻與迷信的厭世主義，主張應該成為以健全的思想、進步時代的理性與智慧來感化上下群眾的宗教，排斥高於常識的虛妄與低於常識的愚昧（境野黃洋 1978，177-179）¹⁵。基於佛教徒當廣泛地追求真理與善德，以掃除一切妄信迷溺為己任，新佛教徒標舉「對於一切宗教教義的深入探究，正是我們佛教徒旗幟鮮明的立場之一」（〈我徒の宣言〉 1-5）。新佛教徒主張捨棄佛教的舊教義、舊信仰、

¹⁵ 原載於《新佛教》，第1卷，第6期，1900年；後收入《新佛教論說集》。

舊組織，但也認為在新與舊之間，歷史性的連結始終不可斷絕。因之，新佛教徒將己之「新」，視為等同於馬丁·路德與加爾文等人捨棄羅馬教皇的舊教，改革建立新教。（『新佛教』子 1978，139）¹⁶

新佛教徒同志會幹部後來多有成為大學、宗門學校教師者，執筆者中也有不少宗教教育與改革家。如出身淨土真宗的村上專精（1851-1929），1887年任曹洞宗大學林講師、哲學館講師；1917年任東京帝國大學印度哲學科教授。1918年成為學士院會員；1923年成為東京帝國大學名譽教授。大內青巒，1897年任教曹洞宗大學；1914年成為東洋大學校長（東洋大學 236-237）。

忽滑谷快天（1867-1934），曹洞宗埼玉縣專門支校、曹洞宗大學林專門本校、慶應義塾大學文學科畢業。1902年被任命為曹洞宗高等中學林的監理與教授，1904年改任曹洞宗大學講師；1911至1914年，赴歐美進行宗教學術考察；1920年就任曹洞宗大學校長；1925年改制，任駒澤大學第一任校長至1934年辭世（石井公成 6-16）。

境野黃洋於明治 43 年（1912）任東洋大學教授；大正 4 年（1915）因東洋大學第三任校長大內青巒患病，由境野黃洋擔任代理校長，再於大正 7 年（1918）真除成為校長，至大正 12 年（1923）離職。境野黃洋後於大正 15 年（1926）進入駒澤大學任教，當時的校長是忽滑谷快天，主要負責教授「佛教演習」；昭和 5 年（1930）境野黃洋以《支那仏教史の研究》，成為第一位駒澤大學文學博士（舊制）（東洋大學 237-238；大野育子 89）。

¹⁶ 原載於《新佛教》，第 1 卷，第 5 號，1900 年；後收入《新佛教論說集》。

加藤玄智（1873-1965），淨土真宗僧侶。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哲學科；昭和8年（1933）後，任國學院大學教授、駒澤大學教授、大正大學講師、明治聖德記念學會研究所所長。其他如加藤咄堂（1870-1949）、土屋詮教（1872-1956）、井上秀天（1880-1945）、川村坦應（1875-1938）、來馬琢道（1877-1964）、島地大等（1875-1927），亦多出身曹洞宗，就讀與任教於曹洞宗學林。

釋慧嚴、石井公成等學者已指出李添春、曾景來、林秋梧、高執德等人於駒澤大學留學時，深受校長忽滑谷快天之影響（釋慧嚴 2008，529-548；石井公成 1-31）。而由大野育子的研究中則可見他們也修習過境野黃洋等「新佛教徒」開授之課程（大野育子 89；三浦節夫 301-308）。當青年新佛教徒成為社會、教育界與佛教宗門的中堅成員，便得以將新佛教運動的理念與舉措，深植於後輩的思想之中。而如被李添春稱為「臺灣的馬丁路德」，深受日本佛教影響的林德林（李添春 62-64），積極推動臺灣佛教改革，批判迷信、主張「正信」、「真信」（林德林 1922，7-8），與日本新佛教徒同志會關於「消滅迷信」、「以對佛教的健全之信仰為根本要義」、「不認為應該維持傳統的宗教制度與儀式」等主張若合符節。曾景來亦曾在 1924 年留學東京時，於《中道》發表〈釋迦牟尼聖哲家〉，批評臺灣佛教腐敗、僧侶無責任、不禪不淨、無宗無旨（曾普信 6-7）；1931 年再發表〈臺灣寺院管見〉，指出臺灣的佛教寺院存在住持安逸、僧伽教育有缺陷、專營葬禮法事、神佛混合等問題；凡此，均可見受到日本新佛教運動的影響（曾景來 1931，13-18）。

如上所述，近代東亞始於日本且世代相續的新佛教運

動，不僅影響日本佛教的改革，也促進臺灣、中國佛教改革的推進。而關於日本僧侶與臺灣本土僧侶在改革觀點上的差異或分歧之細究，筆者將再另文進行討論。

四、結語

日治時期，日本佛教之淨土真宗本願寺派、真宗大谷派、曹洞宗、淨土宗、日蓮宗、臨濟宗妙心寺派與高野山真言宗等宗派傳入臺灣（佛教タイムス社 175-199）。歷經教務所、說教所與寺院功能調整過後，至 1935 年，日本各宗派共在臺灣設立五十六座寺院，一座教務所，一百一十座布教所，信徒共約十七萬人（江木生 1937，15-20；松金公正 1999b，192-211）。

臺灣本土佛教受到日本佛教宗派來臺布教之影響，也出現由本土僧侶所建立的法派（江燦騰 1996，47），包含基隆月眉山法脈（善慧開創於基隆靈泉寺）；臺北觀音山法脈（本圓開創於臺北縣五股鄉凌雲寺）；苗栗法雲寺法脈（覺力與弟子妙果開創於苗栗大湖鄉法雲寺）；高雄大崗山法脈（義永與弟子永定開創於高雄縣阿蓮鄉）。這些法派培養、嗣法的僧徒，輾轉在臺灣各地成立諸多寺院，形成臺灣佛教的傳播網絡（藍吉富 239-240）。

1915 年西來庵事件後，日本殖民政府主導成立南瀛佛教會，進行佛教教育，也推動臺灣佛教的改革，進而影響臺灣佛教的日本化。加上日本來臺宗派先後成立的佛教學校與寺院中的佛學教育機構（江木生 1937，16-17），培育出臺灣本土的佛教菁英，甚至選送人才至日本留學。諸多舉措，均使日治時期臺灣僧侶的教育水準，遠超過清領時期（藍吉富 239-240）。

日治時期在大正、昭和之際出現臺灣新佛教的改造運

動，不只帶來信仰觀念的改變、宗教組織的變革，也衝擊不同文化社群，並引發激烈衝突（江燦騰 2000b，383）。兩次大戰中的「妥協同化政策」，使臺灣本土佛教急速發展，並帶有相當主體性；爾後「日臺佛教平行發展」模式的出現、「西來庵事件」的發生，以及隔年意外發生的「大演講會」，促使臺灣本土佛教朝佛教改革發展與轉型（江燦騰 2000b，610）。隨著接受日本高等佛教教育的佛教菁英歸臺，開展了另一階段的臺灣新佛教運動（江燦騰 2000b，613-614）。

就中，筆者特別關注日治時期出現關於臺灣佛教改革關注的重點與論述，與近代日本新佛教改革運動所呼籲與推動的改革，幾乎如出一轍。臺籍佛教留日學生成為臺灣佛教改革的推手，如同成為他們的學習典範與授課教師的日本「新佛教徒」之訴求，這些留日學生推動的佛教改革，強調的也是精神主義、理性信仰、社會參與，重視佛教研究學術化、佛教教育體制化、通佛教的建立、寺院管理體制化。

日治時期的臺灣佛教發展，不僅是被動的接受日本來臺僧人的教化與影響，本土佛教出現真正的改革呼聲與作為，有極大部分是由赴日求學的佛教知識菁英所推動。他們在日本求學期間，接受經歷新佛教運動的師長與學風之影響，建構其對於佛教義理的新見，以及佛教改革的認知與理念。

根據大野育子之研究，日治時期至少有五十一名臺籍佛教留學生赴曹洞宗興辦的駒澤大學就讀（大野育子 41-42）。返臺後，包含高執德、曾景來、李添春、林秋梧、黃英貴、吳瑞諸、李孝本、王進瑞、張金出等人，更帶著在日本求學習法的經驗，積極推動與參與臺灣佛教界的改革與運作（大野育子 119）。無論是來臺的日籍僧人，或是赴日求學的臺籍僧人，他們所經歷與接受的影響，是明治以來佛教

在面對政治變動、西方宗教與思想挑戰下，所做出的回應。因此，欲深入理解近代臺灣佛教的發展，勢必得將之置於近代日本佛教變革的影響中來做討論。

王俊中曾指出：「由於日本佛教人士是如此積極地從事學習和變革，也由於日本近代採取的擴張主義，使日本近代佛教的改變，實質影響到韓國、臺灣和部分的中國，因此，即使研究近代中國佛教，也當將近代的日本佛教發展視為一個重要的參考點。這樣的視野，確實也是國內學者較少採取的角度。」（王俊中 27）

整個東亞地區，最早由日本佛教界開始意識到佛教面對的挑戰，進而推動「新佛教」的論述與運動，中國亦隨之大聲疾呼並為一系列的佛教改革而努力，對於臺灣的佛教改革運動也造成影響。由此觀之，日治時期臺灣佛教改革運動的出現，可以說是在東亞佛教變革思潮影響下出現的發展。要論日治時期臺灣的佛教改革，包含其思想、哲學、論述與行動，勢必需要放在日本的新佛教運動之脈絡中來做觀察。¹⁷

然而，我們也不能忽視，日治時期佛教知識菁英推動佛教改革的呼聲與行動，在當時也受到不少的挑戰與批評，如圍繞著林德林的「中教事件」，以及彰化崇文社儒生社群為中心對於林德林與佛教界的批判。而同樣積極倡議進行佛教改革的曾景來，在戰後面對政治上的去日本化，一起留學東京的高執德在白色恐怖下，因被以知匪不報的罪名被槍決的陰影，¹⁸ 以及改由漢傳佛教僧侶與中國佛教會主導的局勢，選擇低調噤聲以保全自身，日治時期受到日本新佛教運動影

¹⁷ 近代日本的新佛教運動試圖透過積極地接近社會，以取得現代宗教的資格（菅沼晃 5-6）。

¹⁸ 關於高執德的政治案件，可參考闞正宗、蘇瑞鏞 252-288。

響的改革倡議與行動，終致難竟全功。¹⁹ 關於日治時期臺灣佛教改革運動之遺緒與影響的相關議題，將有待更多的研究與討論。

¹⁹ 關於曾景來的相關研究，可參見李世偉 39-78；闕正宗 2020，105-142。

引用文獻

一、經典文獻或古籍

《太虛大師全書》，CBETA 2025. R1, TX 29, no. 19。

二、研究文獻

三浦節夫：〈『新仏教』を支えた人々〉，《ライフデザイン学
研究》，第7號，2012年，頁291-309。

丸井圭次郎：〈宗教的方面より見たる台湾の民族性に就て〉，
《南瀛佛教》，第4卷，第5號，1926a年，頁2-6。

——：〈宗教的方面より見たる台湾の民族性に就て〉，《南瀛
佛教》，第4卷，第6號，1926b年，頁2-4。

大谷榮一：《近代仏教という視座 戦争・アジア・社会主義》，
東京：ぺりかん社，2012年。

大野育子：《日治時期台灣佛教菁英的崛起——以曹洞宗駒澤大
學臺灣留學生為中心》，2009年，淡江大學，碩士論文。

大場鑑次郎：〈第八次總會挨拶〉，《南瀛佛教》，第9卷，第8
號，1930年，頁2-3。

子經：〈佛教為裨益國家社會說〉，《南瀛佛教》，第3卷，第4
號，1925年，頁7-9。

王兆麟：〈關於臺灣佛教改革〉，《南瀛佛教》，第10卷，第8
號，1932年，頁34-35。

王見川、李世偉：《臺灣的宗教與文化》，臺北：博揚文化，
1999年。

王俊中：〈日本佛教的近代轉變——以佛學研究與教團傳教為
例〉，《獅子吼雜誌》，第33卷，第4期，1994年，頁
27-36。

〈本島人の宗教を統一近く團體設立〉：《臺灣日日新報》，
1921年3月13日，第7版。

〈本會海山支部徵文發表〉：《南瀛佛教》，第3卷，第4號，
1925年，頁26。

田村志學：〈先づ僧侶の素質向上を計れ〉，《南瀛佛教》，第

- 10 卷，第 8 號，1932 年，頁 18-19。
- 田村智友：〈昭和十五年度敬神教化指導者講習會書記ヲ命ス・昭和十五年七月至八月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高等官進退原議〉，《臺灣總督府檔案·進退原議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1940 年 7 月 1 日，典藏號：00010106023X013。
- 石井公成撰、廖欽彬譯：〈日本禪學的近代化與臺灣佛教——以忽滑谷快天與井上秀天為中心〉，《法鼓佛學學報》，第 27 期，2020 年，頁 1-31。
- 江木生：〈卷頭言〉，《南瀛佛教》，第 10 卷，第 8 號，1932 年，頁 1。
- ：〈回顧南瀛佛教誌創刊十週年〉，《南瀛佛教》，第 11 卷，第 7 號，1933 年，頁 85。
- ：〈內地佛教の臺灣傳來と其現勢〉，《南瀛佛教》，第 15 卷，第 2 號，1937 年，頁 15-20。
- ：〈臺灣佛教二十年〉，《臺灣佛教》，第 21 卷，第 12 號，1943a 年，頁 26-39。
- ：〈本誌各號の編集者（自創刊至終刊）〉，《臺灣佛教》，第 21 卷，第 12 期，1943b 年，頁 39。
- 江島尚俊：〈「近代」をめぐる葛藤——新仏教と精神主義〉，《宗教研究》，第 82 卷，第 4 號，2009 年，頁 439-440。
- 江雲松：〈臺灣佛教振興策〉，《南瀛佛教》，第 3 卷，第 2 號，1925 年，頁 11-16。
- 江燦騰：《臺灣佛教與現代社會》，臺北：三民書局，1993 年。
- ：〈日據時代臺灣北部曹洞宗大法派的崛起〉，《臺灣佛教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財團法人佛教青年文教基金會，1996 年，頁 47-84。
- ：《臺灣佛教百年史之研究（1895-1995）》，臺北：南天書局，1997 年。
- ：〈日據時期臺灣新佛教運動的開展與儒釋知識社群的衝突——以「臺灣馬丁路德」林德林的新佛教事業為中心〉，《臺灣文獻》，第 51 卷，第 3 期，2000a 年，頁 9-80。

- ：《殖民統治與宗教同化的困境：日據時期臺灣新佛教運動的頓挫與轉型》，2000b年，國立臺灣大學，博士論文。
- ：《日據時期臺灣佛教文化發展史》，臺北：南天書局，2001年。
- ：〈日據時期臺灣新佛教運動的先驅——「臺灣佛教馬丁路德」林德林的個案研究〉，《中華佛學學報》，第15期，2002年，頁255-303。
- ：《臺灣近代佛教的變革與反思》，臺北：東大圖書，2003年。
- ：〈臺灣近代（1895-1945）佛教史研究之再檢討〉，《佛學研究中心學報》，第10期，2005年，頁287-326。
- ：《新視野下的臺灣近現代佛教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
- ：《聖域踏尋——近代漢傳佛教史的考察》，臺北：博揚文化，2008年。
- ：《臺灣佛教史》，臺北：五南圖書，2009年。
- ：《當代臺灣心靈的透視：從雙源匯流到逆中心互動傳播》，臺北：秀威資訊，2019年。
- ：《東亞現代批判禪學思想四百年》（第一卷），臺北：元華文創股份有限公司，2021a年。
- ：《東亞現代批判禪學思想四百年》（第二卷），臺北：元華文創股份有限公司，2021b年。
- ：《風城佛影的歷史構造：三百年來新竹齋堂佛寺與代表性人物誌》，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21c年。
- 江寶釵：〈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對世務之肆應——以連橫的漢學傳播事業為觀察核心〉：《成大中文學報》，第26期，2009年，頁81-118。
- 佐久間尚孝：〈臺灣佛教の發展策〉，《南瀛佛教》，第10卷，第8號，1932年，頁26-28。
- 佐佐木芳照：〈臺灣を去るに當りて〉，《南瀛佛教》，第4卷，第5號，1926年，頁12-13。
- 何燕生：〈佛教是一個「想像的共同體」嗎？太虛大師佛教革新運動與日本〉，《無礙法界·正教弘傳：人間佛教在東亞

- 與東南亞的傳佈》，陳劍煌主編，香港：中文大學人間佛教研究中心，2020年，頁190-194。
- 佛教タイムス社編：《佛教大年鑑》，東京：佛教タイムス社，1969年。
- 吳標：〈曉鐘〉，《南瀛佛教》，第10卷，第8號，1932年，頁62-63。
- 〈役員及教師補任免〉：《南瀛佛教》，第3卷，第4號，1925年，頁25。
- 〈我徒の宣言〉：《新佛教》，第1卷，第1期，1900年，頁1-5。
- 李世偉：〈跨界者：略論臺灣佛教史關鍵人物曾景來〉，《華人宗教研究》，第20期，2022年，頁39-78。
- 李添春：〈寺廟をたづねて〉，《臺灣時報》，1934年，頁62-64。
- 〈西山吟社擊鉢錄〉：《臺南新報》，第11458號，1933年12月3日，頁8。
- 〈西山吟社擊鉢錄——潛水艇〉：《南雅》，第7號，1933年，頁14。
- 〈來臺中華僧一行〉：《臺灣日日新報》，1925年11月27日，第4版。
- 〈制定支部規則〉：《南瀛佛教》，第2卷，第5號，1924年，頁25-26。
- 東洋大學編：《東洋大学五十年史》，東京：東洋大學，1937年。
- 東海宜誠：〈臺灣佛教の振興に就いて〉，《南瀛佛教》，第10卷，第8號，1932年，頁22-26。
- 松金公正：〈植民地時期臺灣における日本仏教寺院及び説教所の設立と展開〉，《臺灣史研究》，第16號，1998年，頁18-32。
- ：〈關於日據初期日本佛教從軍布教使的活動——以淨土宗布教使橋本定幢〈再渡日誌〉為例〉，《圓光佛學學報》，第3期，1999a年，頁383-422。
- ：〈日據時期日本佛教之臺灣布教——以寺院數及信徒人

- 數的演變為考察中心〉，《圓光佛學學報》，第3期，1999b年，頁191-221。
- ：〈日本殖民地統治初期布教使眼中之臺灣佛教—以佐佐木珍龍《從軍實歷夢遊談》為中心—〉，《史聯雜誌》，第35號，1999c年，頁21-36。
- ：〈曹洞宗布教師による臺灣仏教調査と『臺灣島布教規程』の制定—佐々木珍龍『從軍實歷夢遊談』を中心に—〉，《比較文化史研究》，第2號，2000年，頁45-68。
- ：〈日本統治期における妙心寺派 臺灣不況の変遷—臨濟護国禅寺建立の占める位置—〉，《宇都宮大学国際学部研究論集》，第12號，2001年，頁137-162。
- ：〈日本植民地初期臺灣における浄土宗布教方針の策定過程（上）〉，《宇都宮大学国際学部研究論集》，第13期，2002a年，頁213-232。
- ：〈日本植民地初期臺灣における浄土宗布教方針の策定過程（下）〉，《宇都宮大学国際学部研究論集》，第14期，2002b年，頁87-109。
- ：〈植民地期臺灣における曹洞宗の教育事業とその限界—宗立学校移転と普通教育化の示すもの—〉，《臺灣の近代と日本》，臺灣史研究部会編，愛知：中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2003年，頁259-290。
- 〈板橋支部長指名〉：《南瀛佛教》，第2卷，第5號，1924年，頁26。
- 〈板橋支部解稱及近況〉：《南瀛佛教》，第3卷，第2號，1925年，頁41-42。
- 林玠宗：〈佛化新僧之宣言〉，《南瀛佛教》，第4卷，第6號，1926a年，頁22-23。
- ：〈佛化新僧簡章〉，《南瀛佛教》，第4卷，第6號，1926b年，頁23-24。
- 林述三：〈佛教為裨益國家社會說擬作〉，《南瀛佛教》，第3卷，第4號，1925年，頁6-7。
- ：〈謹賀新年〉，《南瀛佛教》，第6卷，第1號，1927年，頁6。

- ：〈暑中御見舞〉，《南瀛佛教》，第6卷，第4號，1928年，頁72。
- ：〈謹賀新年〉，第7卷，第1號，1929年，頁18。
- 林進發編著：《臺灣官紳年鑑》，臺北：民眾公論社，1932年。
- 林徹妙：〈佛教徒的真使命〉，《南瀛佛教》，第12卷，第5號，1934年，頁20。
- 林德林：〈臺灣佛教：新運動先聲〉，《中道》，第69期，1929年，頁1-2。
- ：〈臺灣佛教改革前提〉，《南瀛佛教》，第10卷，第8號，1932年，頁46-48。
- 林德林編：《在家佛教聖典》，臺中：臺中佛教會館，1922年，頁7-8。
- 林澄波：〈式辭〉，《中道》，第1期，1913年，頁10。
- ：〈最高之目的〉，《中道》，第15期，1925年，頁10。
- 林韻柔：〈從護教到理信——近代日本「新佛教」的建構與轉化〉，《佛學研究》，第40期，2024年，頁170-190。
- 芝原玄超：〈臺灣佛教改革に對する愚見〉，《南瀛佛教》，第10卷，第8號，1932年，頁2-3。
- 〈南佛幹部講習會〉：《臺灣日日新報》，1924年5月25日，第6版。
- 〈南瀛佛教會之沿革〉：《南瀛佛教》，第1卷，第1號，1923年，頁19-33。
- 〈南瀛佛教會之沿革（續）〉：《南瀛佛教》，第2卷，第4號，1924年，頁26-32。
- 〈南瀛佛教會會則〉：《南瀛佛教》，第9卷，第8號，1930年，頁1。
- 〈南瀛佛教講習〉：《臺灣日日新報》，1921年7月4日，第4版。
- 姚麗香：〈日據時期臺灣佛教與齋教關係之探討〉，《臺灣佛教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財團法人佛教青年文教基金會，1996年，頁71-84。
- 〈急告！！（請一讀）〉：《南瀛佛教》，第7卷，第5號，1929年，頁5。

- 胎中千鶴：〈日本統治期臺灣の仏教勢力—1921年南瀛仏教 成立まで〉，《史苑—東洋史特集号》，第58卷，第2號，1998a年，頁23-45。
- ：〈日本統治期臺灣における臨濟宗妙心寺派の活動—1920～30年代を中心に〉，《臺灣史研究》，第16號，1998b年，頁3-17。
- ：〈日本統治期臺灣の齋教に関する一視點〉，《史苑》，第60卷，第2期，2000年，頁50-72。
- 原幹洲：《南進日本之第一線に起つ：新臺灣之人物》，臺北：拓務評論社臺灣支社，1936年。
- 原幹洲編：《自治制度改正十週年紀念人物志》，臺北：勤勞と富源社，1931年。
- 柴田幹夫：〈大谷光瑞と臺灣：高雄「逍遙園」を中心にして〉，《宗教研究》，第87號，2014年，頁259-260。
- ：〈大谷光瑞と臺灣の近代化〉，《研究論集》，第13號，2017a年，頁45-56。
- ：《興亞揚佛：大谷光瑞與西本願寺的海外事業》，臺北：博揚文化，2017b年。
- ：《臺灣の日本仏教：布教・交流・近代化》，東京：勉誠出版，2018年。
- 〈海山支部置揭示場〉：《南瀛佛教》，第4卷，第3號，1926年，頁34。
- 翁聖峰：〈《鳴鼓集》反佛教破戒文學的創作與儒釋知識社群的衝突〉，《臺灣文學學報》，第9期，2006年，頁83-105。
- 〈送迎新舊兩會長之辭〉：《南瀛佛教》，第7卷，第5號，1929年，頁4。
- 〈基隆靈泉寺佛學院開院式〉：《南瀛佛教》，第2卷，第6號，1924年，頁30。
- 張宗載：〈我對於東亞佛教信徒今後之希望〉，《南瀛佛教》，第4卷，第1號，1926a年，頁7-9。
- ：〈新佛化運動與中日親善之實現（上）〉，《南瀛佛教》，第4卷，第5號，1926b年，頁28-30。
- ：〈新佛化運動與中日親善之實現（下）〉，《南瀛佛

- 教》，第4卷，第6號，1926c年，頁26-28。
- ：〈今後真佛教之產生與東亞民族之努力〉，《南瀛佛教》，第4卷，第6號，1926d年，頁21-22。
- 許丙丁：〈五十年來南社的社員與詩〉，《臺南文化》，第3卷，第1期，1953年，頁4-17。
- 連橫：《臺灣詩薈》，《連雅堂先生全集》（第十集），南投：臺灣省文獻會，1992年。
- 郭貞孜：《林述三暨《南瀛佛教》相關作品研究》，2021年，淡江大學，博士論文。
- 陳祖舜：〈佛教為裨益國家社會說〉，《南瀛佛教》，第3卷，第5號，1925年，頁10-11。
- 陳湛恩：〈齊桓公論〉，《臺灣文藝叢誌》，第1年，第5號，1919年，頁64-65。
- ：〈地方自治論〉，《臺灣文藝叢誌》，第2年，第1號，1920a年，頁24-25。
- ：〈西門豹治鄴論〉，《臺灣文藝叢誌》，第2年，第4號，1920b年，頁23-24。
- ：〈文翁治蜀論〉，《臺灣文藝叢誌》，第2年，第5號，1920c年，頁30-32。
- ：〈趙佗據南越論〉，《臺灣文藝叢誌》，第3年，第4號，1921年，頁33-34。
- ：〈偽善論〉，《臺灣文藝旬報》，第1年，第10號，1922年，頁7。
- 陳雍：〈陳雍女士宣言〉，《南瀛佛教》，第4卷，第6號，1926年，頁24。
- 傅幼懷：〈臺灣佛教振興策〉，《南瀛佛教》，第3卷，第2號，1925a年，頁17-20。
- ：〈佛教為裨益國家社會說〉，《南瀛佛教》，第3卷，第4號，1925b年，頁9-10。
- 〈創設南瀛佛教會新店會館〉：《南瀛佛教》，第2卷，第3號，1924年，頁27。
- 勝見榮明：〈臺灣佛教界の現状を一瞥して所感を述べんとす〉，《南瀛佛教》，第10卷，第8號，1932年，頁14-17。

- 善雄：〈佛教的社會主義〉，《南瀛佛教》，第3卷，第5號，1925a年，頁8-10。
- ：〈吾人何故信佛教乎？何謂學佛乎？〉，《南瀛佛教》，第3卷，第5號，1925b年，頁16-17。
- ：〈吾人何故信佛教乎？何謂學佛乎？（續）〉，《南瀛佛教》，第4卷，第1號，1926a年，頁19-20。
- ：〈春與佛之使命〉，《南瀛佛教》，第4卷，第1號，1926b年，頁14-15。
- 曾芝芳：〈韓信論〉，《臺灣文藝叢誌》，第1年，第8號，1919年，頁43-44。
- ：〈張良論〉，《臺灣文藝叢誌》，第2年，第1號，1920年，頁49-50。
- ：〈釋教論〉，《臺灣文藝叢誌》，第3年，第6號，1921年，頁4-5。
- ：〈東漢黨錮論〉，《臺灣文藝叢誌》，第4年，第2號，1922年，頁7。
- ：〈西門豹〉，《臺南新報》，第8096期，1924a年，頁5。
- ：〈田橫論〉，《臺灣文藝叢誌》，第4年，第2號，1924b年，頁7。
- 曾普信：〈釋迦牟尼聖哲家〉，《中道》，第16期，1924年，頁6-7。
- 曾景來：〈臺灣寺院管見〉，《南瀛佛教》，第9卷，第3號，1931年，頁13-18。
- ：〈臺灣宗教會設立の提唱〉，《南瀛佛教》，第10卷，第8號，1932年，頁36-38。
- 甯達蘊：〈佛法與人生〉，《南瀛佛教》，第4卷，第1號，1926a年，頁9-10。
- ：〈佛家大乘小乘之比較〉，《南瀛佛教》，第4卷，第2號，1926b年，頁12-16。
- ：〈佛教的社會化〉，《南瀛佛教》，第5卷，第4號，1927年，頁32-37。
- 菅沼晃：〈新仏教運動と哲学館：境野黄洋と高嶋米峰を中心

- に〉，《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49卷，第1號，2000年，頁6。
- 黃美娥：〈差異／交混、對話／對譯——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的身體經驗與新國民想像（1895-1937）〉，《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28期，2006年，頁81-119。
- 黃論語：〈鷺洲庄同風會各分會代表者黃論語呈南瀛佛教會海山支部長劉蘭亭之書翰文〉，《南瀛佛教》，第4卷，第1號，1926年，頁35。
- 愛佛：〈對於臺灣佛教之批評與感想〉，《南瀛佛教》，第10卷，第8號，1932年，頁56-61。
- 『新佛教』子：〈新佛教と新宗教〉，原載於《新佛教》，第1卷，第5號，1900年；後收入《新佛教論說集》（上卷），1978年，頁139-141。
- 〈新設南瀛佛教會板橋支部〉：《南瀛佛教》，第2卷，第5號，1924年，頁25。
- 楊惠南：〈臺灣佛教古詩選輯：從明鄭到日治時期第1首～第20首〉，《正觀》，第90期，2019年，頁130-131。
- ：〈帝國陰影下的新芽：《南瀛佛教》所顯現的臺灣佛教〉，《護僧》，第33期，2003年，頁4-32。
- 葉連鵬：〈導言〉，《蔡旨禪集》，葉連鵬選注，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2年，頁2。
- 境野黃洋：〈常識主義〉，原載於《新佛教》，第1卷，第6期，1900年；後收入《新佛教論說集》，1978年，頁177-179。
- ：《新佛教十年史》，東京：新佛教徒同志會，1910年。
- 福嶋信吉：〈明治後期の「新仏教」運動における「自由討究」〉，《宗教研究》，第316號，1998年，頁107-132。
- 臺南州共榮會編：《南部臺灣誌》，臺北：南天書局，1994年。
- 〈臺灣之宗教狀況〉：《南瀛佛教》，第4卷，第4號，1926年，頁36-38。
- 臺灣文學館線上資料平臺：「林述三」，<https://db.nmtl.gov.tw/site5/author?id=1080>，2023.5.31。
- 臺灣文學館線上資料平臺：「陳湛恩」，<https://db.nmtl.gov.tw/site5/author?id=911>，2023.5.31。

- 臺灣文獻館文獻檔案查詢系統：<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Archive>，2023.5.31。
- 臺灣佛教史料庫：<https://buddhism.lib.ntu.edu.tw/museum/TAIWAN/>，2023.5.31。
- 臺灣記憶：「林馨蘭」，https://tm.ncl.edu.tw/article?u=016_002_000293807&lang=chn，2023.5.31。
- 臺灣總督府：《臺灣宗教調查報告書》（第一卷），臺北：捷幼出版社，1993年。
- 遠藤所六等編：《臺中市史》，臺中：臺灣新聞社，1934年。
- 歐調蝠：〈佛教為裨益國家社會說〉，《南瀛佛教》，第3卷，第5號，1925年，頁11-12。
- 蔡南樵：〈臺灣佛教振興策〉，《南瀛佛教》，第3卷，第3號，1925年，頁13-15。
- 蔡敦輝：〈臺灣佛教振興策〉，《南瀛佛教》，第3卷，第2號，1925年，頁20-24。
- 鄭卓雲：《臺灣開元寺誌略稿》，臺南：開元寺，1930年。
- ：〈臺灣開元禪寺沙門列傳〉，《南瀛佛教》，第9卷，第4號，1931a年，頁24-27。
- ：〈臺灣開元禪寺沙門列傳〉，《南瀛佛教》，第9卷，第8號，1931b年，頁29-31。
- ：〈臺灣開元禪寺沙門列傳〉，《南瀛佛教》，第9卷，第9號，1931c年，頁19-20。
- 〈歷代本誌編輯者〉：《南瀛佛教》，第11卷，第7號，1933年，頁11。
- 〈總會記事〉：《南瀛佛教》，第9卷，第8號，1930年，頁5-24。
- 藍吉富：〈臺灣佛教之歷史發展的宏觀式考察〉，《中華佛學學報》，第12期，1999年，頁237-248。
- 魏秀玲：《蔡旨禪及其《旨禪詩畫集》研究》，2005年，國立政治大學，碩士論文。
- 〈懸賞論文發表〉：《南瀛佛教》，第3卷，第2號，1925年，頁40-41。
- 蘇全正：《臺灣佛教與家族——以霧峰林家為中心之研究》，2011

- 年，國立中正大學，博士論文。
- 蘇秀鈴：《日治時期崇文社研究》，2000年，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 覺空子：〈臺灣佛教振興策〉，《南瀛佛教》，第3卷，第3號，1925年，頁11-13。
- 釋慧嚴：〈西來庵事件前後臺灣佛教的動向：以曹洞宗為中心〉，《中華佛學學報》，第10期，1997年，頁279-310。
- ：〈日本曹洞宗與臺灣佛教僧侶的互動〉，《中華佛教學報》，第11期，1998年，頁119-153。
- ：〈從臺閩日佛教的互動看尼僧在臺灣的發展〉，《中華佛學學報》，第12期，1999年，頁249-274。
- ：《臺灣佛教史論文集》，高雄：春暉出版社，2003年。
- ：〈太虛、圓瑛二大師與臺灣佛教界〉，《中華佛學學報》，第17期，2004年，頁215-242。
- ：〈日治時期來臺淨土宗的開教事業〉，《玄奘人文學報》，第5期，2005年，頁35-63。
- ：〈從來臺日本佛教的傳布看宗教本土化〉，《玄奘人文學報》，第6期，2006年，頁125-148。
- ：《臺灣與閩日佛教交流史》，高雄：春暉出版社，2008年。
- 闞正宗：《臺灣佛教一百年》，臺北：東大圖書，1999年。
- ：《臺灣佛寺的信仰與文化》，臺北：博揚文化，2004年。
- ：《臺灣佛教史論》，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
- ：《臺灣日治時期佛教發展與皇民化運動：「皇國佛教」的歷史進程（1895-1945）》，臺北：博揚文化，2011年。
- ：〈日本殖民時期臺灣的佛教期刊——羅妙吉與《亞光新報》兼論林秋梧的左翼《赤道報》〉，《佛教圖書館館刊》，第55期，2012a年，頁8-22。
- ：〈日治臺灣佛教的特點與研究〉，《圓光佛學學報》，第18期，2012b年，頁97-138。
- ：〈殖民佛教的「認同」與戰後「轉向」——王兆麟的跨政權弘法事業〉，《玄奘佛學研究》，第21期，2014a年，頁29-60。

- ：《臺灣佛教的殖民與後殖民》，臺北：博揚文化，2014b年。
- ：《臺灣觀音信仰的「本土」與「外來」》，臺北：博揚文化，2018年。
- ：〈臺灣殖民時期「佛教教化」與「迷信陋習」改革的推動——以曾景來（1902-1977）為中心〉，《法鼓佛學學報》，第27期，2020年，頁105-142。
- ：《臺灣佛教通史 第二卷 日本佛教宗派的傳入與本土法脈的崛起》，臺北：彌陀文教基金會，2022a年。
- ：《臺灣佛教通史 第三卷 日本殖民社會下佛教的轉型》，臺北：彌陀文教基金會，2022b年。
- 闕正宗主編：《佛教、歷史、留學交流視角下的近代東亞和日本：柴田教授退休紀念文集》，臺北：博揚文化，2021年。
- 闕正宗、蘇瑞鏘：〈臺南開元寺僧證光（高執德）的「白色恐怖」公案再探〉，《中華人文社會學報》，第2期，2005年，頁252-288。
- 顧敏耀：〈召喚客家鄉鎮的歷史——日治時期桃園新屋的人物群像與權力網絡〉，《清雲學報》，第31卷，第3期，2011年，頁71-99。
- ：〈召喚城市記憶·再現人文風采——新北市清領與日治時期的古典詩社與詩人考察〉，《真理大學人文學報》，第13期，2012年，頁51-90。

New Buddhist Movements in Taiwan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Focused on the Calls for Submissions on Buddhist Reform in *Nanying Buddhism*

Yunjo Lin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Abstract

In modern East Asia, including Japan, Korea, China, and Taiwan, there emerged a “New Buddhist Movement,” advocating the elimination of superstition and folk beliefs inherited from old Buddhism. Instead, it aimed to establish a “New Faith” based on rational understanding of Buddhist doctrines and historical facts. To achieve this goal, a series of initiatives were undertaken to “revive” or “revitalize” Buddhism.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Taiwan’s Buddhist community also saw a group of outspoken young Buddhists striving for reform. They received education in the new style of Buddhist Sangha, and their views on Buddhist doctrines, activities, and the role Buddhism should play in the era and society were different from the pas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essays on Buddhist revitalization and reform published in the representative journal of the Buddhist community: *Nanying Buddhism*. It examines the changes in relevant advocates and issues of Buddhist reform, as well as the Japanese-Taiwanese Buddhist network and the intellectual trends of the time.

Keywords

Nanying Buddhism, New Buddhist Movement, Lin Shu-san, Lin Te-lin, reform of modern Buddhism